

从土壤到寄主：论亲子互动的任务寄生性与中国城市家庭教育焦虑

王德生 · 德麦国际 SDE 学派 · AI时代的教育 · 2026年7月24日 · 约 23,161 字 · 10 条参考文献 · 三种阅读模式

摘要

当前研究多从家长心理、文化资本竞争或劳动时间挤压所导致的“制度性空缺”来解释城市家庭教育焦虑。本文提出一个更底层的结构性判断：中国城市家庭亲子互动在深度上依赖于由学校持续供给的任务系统；一旦这一外部任务中介因技术或政策原因被削弱，家庭便因缺乏自主互动内容而陷入塌缩。本文将这种深度依赖命名为“任务寄生性”。这一概念指的并非家庭缺乏互动时间或惯习，而是亲子互动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丧失了独立生成议程的能力——更准确地说，它在现代公私分离、全职劳动与公立教育扩张的历史条件下，从未被赋予发展这种能力的机会，其日常节奏、话语主题和情感接触实际上全部锚定在外部机构提供的任务架构之上。

关键词：家庭教育焦虑；人工智能教育；意图逆向转化；监控债务；绩效主体性；共在场；最近邻辨析

一、引言：焦虑的议程缺失

一个城市双亲家庭的夜晚，被两条叙事切割。一条是劳动的叙事：父母双方在通勤与加班后最早晚上七点半到家，身体里残留着全天高强度认知劳动所累积的应激激素。另一条是教育的叙事：手机上的家长群仍在送达学校的指令——作业须检查签字，课外阅读须记录时长并上传，第二天的活动须家长备好材料。两条叙事之间，夹着那个被命名为“亲子时间”的短暂窗口，通常不超过九十分钟。

在大多数关于家庭教育焦虑的分析中，这个窗口被理解为一个能力问题：家长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管理好这段时间，于是焦虑产生。从心理学取向的“家长素质论”到社会学取向的“文化资本竞争论”，再到近年崛起的“制度挤压论”，解释的焦点逐渐从个体心理上移到制度结构，已经比最初的话语进了一大步。学者们揭示了母职在市场化背景下如何被重塑为一种“经纪人化”的密集劳动（杨可，2018），揭示了城市中产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如何被双重规训（肖索未，2014），揭示了家校关系中普遍存在的“责任转嫁”——学校系统性地将教学监督职能连同认知劳动一起外包给家庭。这些研究已经逼近了问题的深层结构。

本文承续这一制度分析的路径，但试图在它的地基上再往下挖一层。本文要追问的，不是家庭“丧失了什么”，而是家庭“从来拥有过什么”。那个被认为“应然存在”的大片黄昏里的闲聊、周末无目的的散步、从共同生活中自然长出的情感默契——它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制度化的想象，而非一项曾被普遍拥有的实际能力？当我们把战后欧美中产阶级全职母亲文化所催生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情感陪伴”理想当作分析基准时，我们是否已经把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误认成了人类家庭的普遍常态？

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城市家庭亲子互动，从来就不是由家庭内部自主生成的；它在结构上深度寄生于外部机构——尤其是学校——供给的任务系统。日常亲子间的对话主题、共处节奏和情感接触，绝大部分需要依托于一个由学校布置、家长执行、孩子完成的“任务骨架”才能被启动和维持。当这个任务骨架中的关键节点（如辅导作业）被AI等外部力量撤走，家庭暴露出的不是“惯习退化”，而是“内容真空”——一种没有外来议程就无法自我组织互动的深层结构性依赖。本文将这种依赖命名为任务寄生性。

这一命名试图完成一个双重翻转。首先，它翻转了“亲密关系自足”的预设：不是好的家庭互动先于任务而存在，而是任务往往是互动得以发生的脚手架。其次，它翻转了对“家校共育”的纯批判视角：学校任务的转嫁固然是无偿劳动的外包，但同时它也是家庭互动议程的免费供给者；家庭之所以一边抱怨、一边依赖，正是因为这些任务为那个已经严重缺乏内容来源的亲子关系提供着仅存的话术和脚本。教育的焦虑，因而并不单纯源于“被榨干”，更源于“被断供”——当外部议程的供给出现裂缝，家庭发现自己不仅没有时间，更重要的是没有“一起来做点什么”的题目。

在展开论证之前，有必要将此概念与它最接近的几个理论邻居先行划分边界。“任务寄生性”不同于组织社会学中的“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e）。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的是组织因关键资源的外部控制而丧失自主性（Pfeffer & Salancik, 1978），但家庭对学校任务的依赖并不只是“学校掌握了家庭需要的某种稀缺资源（如升学资格）”，而是家庭在互动内容的生成机制本身已经被外部接管——不是“我需要你的资源来完成我的议程”，而是“我需要你的议程来让我有东西可做”。这两种依赖的差别，类似一家公司因为原料供应被上游垄断而受制于人，与一家公司的产品研发部门本身已经被外包给了另一家公司：前者是资源层面的受制，后者是能力的结构性外移。

布迪厄的“误识”（*méconnaissance*）与符号暴力理论揭示了行动者如何将外部结构的强制内化为自身的惯习与判断标准（Bourdieu, 1980），这一点在家庭教育领域当然成立——许多家长确实将“辅导作业”无条件地接纳为“好父母”的本分，而不再追问这个本分是由谁、在何种条件下被定义出来的。但任务寄生性并不主要发生在“认知层面的不承认”上，而是发生在更底层的“实践材料层面的缺失”上。一个每晚给孩子听写英语单词的母亲，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套任务是由学校单方面下达的；她意识到了，但她手边没有其他可以启动一段有情感浓度的亲子共处的具体材料。区别在于：误识理论追问的是“行动者为何看不见结构的任意性”，而任务寄生性追问的是“当行动者看见了任意性之后，她手边还有什么可用的东西”。这一区分将概念的重心从意识结构移到了议程供给的物质性层面。

与情感劳动理论的对话同样必不可少。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其开创性工作中揭示了情感如何被市场化、标准化，并成为劳动的一部分（Hochschild, 1983）。此后，伊鲁兹（Eva Illouz）等学者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将情感生活外包、商品化，使得亲密关系日益依赖外部消费场景和专家系统来维系（Illouz, 2007）。本文的分析确实立足于这一传统：学校任务系统本质上是国家通过教育制度向家庭提供的一套“情感劳动的外部脚本”——它为亲子之间的情感接触预设了时间、主题、角色和评价标准。但本文试图在这一传统之上推进一步。情感劳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关系如何被经济与制度重新定义”，而任务寄生性追问的是一个更前提性的问题：“那些被重新定义的关系，在被定义之前，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情感劳动理论分析了关系在被商品化、被脚本化过程中的异化，但它往往预设了一个先于异化的、较为原初的亲密关系形态作为参照。而本文要论证的恰恰是：在中国城市家庭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参照形态——即独立于外部脚本的、自主

生成的亲子情感互动——从未获得过制度化的实现机会。“寄生”揭示的非但不是一段已经被商品化的关系如何被学校进一步榨取（这是制度挤压论已经做得很好的工作），而是家庭在亲子互动这个领域里从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内容”——它的第一套互动脚本就是学校给的，它不是在“失去”，而是在“从未真正拥有”的意义上处于一个空乏的状态。

这便切出了本文希望切开的、既有概念体系尚未充分照亮的那道缝隙：现有理论解释了家庭“如何被剥夺”，而未能解释家庭在亲子互动内容的生成源头上“为何始终需要外部供给”。“任务寄生性”不是要否定“剥夺”的存在，而是要指出，在剥夺发生之前，家庭就已经被安置在一种依赖于外部骨架才能运行的结构位置上。认清这一点，是将政策想象从“修复剥夺”转向“设计供给”的前提。

为铺展这一论证，本文在第二节首先回到历史——不是作为背景陈述，而是作为论证的核心支柱。它将展示：中国城市家庭在传统社会、计划经济时期与市场化时期，其亲子互动内容始终由不同的外部骨架所组织。由此论证，“任务寄生性”并非当代独有的“堕落”，而是一种结构位置的延续与变形。第三节转入当代的制度分析，首先分析劳动时间制度如何将家庭时间预算压至极限，并由此强化了家庭对学校任务作为互动议程的寄生性需求；继而转向学校一侧，揭示家校任务系统的隐秘功能——互动内容的供给——并正式界定“任务寄生性”的概念内涵。第四节在此基础上引入两个微观案例，但并不止于现象印证，而是深入追踪家庭在“作业辅导被AI替代”前后的内部挣扎过程，追问这些失败的尝试如何反过来再生产了寄生结构。第五节重看AI时代的焦虑爆炸：当辅导作业这一核心寄生节点被技术移除，家庭为何没有迎来解放，反而迎来更深的失落——并通过“议程性焦虑”这一现象命名，追问焦虑在家庭主体层面是如何被具体“结算”出来的。第六节正面回应“互动能力可否习得”这一最强反方挑战，并论证本文的方案（公共骨架供给）与“期待家庭自发习得”的根本区别。第七节从政策层面展开，论证走出任务寄生性困境的出路不在于企图回到一种想象中的前任务亲密状态，而在于公开承认寄生现实及其历史纵深，并主动为家庭设计可选择的公共任务架构。最后，结论总结论证并给出明确的证伪条件。

二、骨架更替：中国城市家庭亲子互动的历史溯源

如果本文的核心判断成立——城市家庭亲子互动在结构上长期寄生于外部任务骨架——那么这一判断必须能够承受历史的检验。它不能只是一个对当代状况的共时性诊断，还必须能够说明：在当代学校系统成为主要寄主之前，家庭亲子互动的内容骨架是由什么供给的？这种供给的更替是如何发生的？当代的“任务寄生性”究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还是一种结构位置的延续与变形？

本节试图给出一个谨慎的回答。必须首先坦白：关于中国城市家庭日常亲子互动模式的系统历史记录十分稀少。传统历史文献多记载家训、科举、孝道等规训话语，而非家庭内部日常互动的实际样态；近现代的社会调查虽然开始触及市民家庭生活，但针对亲子互动内容的详细记录仍属碎片。本节所依赖的，主要是一系列相关领域研究的间接证据与合理推断，包括家庭史、劳工史、儿童史、单位制度研究以及教育社会学的既有积累。这个历史论证因此不是一个封闭的结论，而是一个可被未来研究修正的开放假说。

2.1 传统社会的劳作骨架与节庆骨架

在农业中国的家庭经济中，亲子共处从未以“陪伴”为目的，而是以“共同劳动”为形式。儿童从能够行走说话起，便逐步被纳入家庭的劳动节奏：拾柴、放牛、带弟妹、递送农具。亲子的互动——交谈、指令、责骂、偶尔的温情——绝大多数发生在劳动场景之中。这不是因为古人缺乏“亲子情感”的观念（大量的悼亡诗、家书、教子诗可以证明情感的存在），而是因为前工业社会的家庭，其首要角色是生产单位，而非情感庇护所。劳动既占据了时间，也提供了互动的内容骨架：做什么、怎么做、做多久、做完之后是什么——这些构成了一个不需要刻意设计的、从生产过程中自然流出的亲子议程。

与此同时，传统节庆、家族祭祀、婚丧嫁娶等集体仪式，构成了另一种更为程式化的亲子互动骨架。在这些仪式中，长辈与晚辈的角色、行动序列、话语规范均由习俗高度规定。孩子跟随父母参与祭祀，观看并模仿礼仪动作，在这一过程中，亲子之间的“共同在场”与“共同执行任务”是合成一体的。传统社会的睡前故事、童谣、民间传说，虽然看起来更接近“非任务性”的互动形态，但仔细审视便会发现，它们同样是高度脚本化的：故事有固定的叙事结构，童谣有固定的韵律格式，讲述者与听众的角色是世代沿袭下来的一套文化仪轨，而非随机的“自发互动”。

关键之处在于：这些传统骨架的供给者是共同体本身——家族、村落、宗教社群。骨架是长期稳定的，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和世代延续性，评价机制是社区内部的模糊口碑，而非量化的分数。但骨架的角色是清晰的：它为亲子互动提供了现成的“做什么”和“怎么做”。家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从零生成互动内容，而是直接接入共同体已经编制好的那一套。

2.2 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骨架与政治任务骨架

1949年以后，中国城市家庭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大规模就业、单位制度的全面建立、公立教育的迅速扩张，三重力量共同重塑了亲子互动的时空条件和内容来源。

首先，妇女进入工厂和机关，使传统社会中母亲作为儿童日常照料与劳动引导者的角色发生了断裂。在单位制下，劳动时间与家庭时间被严格划分，八小时工作制加上政治学习、义务劳动，使得工作日中的亲子共处时间显著压缩。托儿所、幼儿园的普遍设立，则进一步将相当一部分学龄前儿童的日常时间从家庭转移到了集体机构。家庭亲子互动的“量”显著减少了。

但与“量”减少同时发生的，是一套新的互动骨架的嵌入：单位制度所派生的政治任务与集体活动。单位制时期的中国家庭，其日常生活被严密地编织进一套政治-行政议程之中。家长参加政治学习、写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响应卫生运动；孩子在学校参与少先队活动、学习雷锋、参加劳动课。在很多时候，这两条议程会交汇——“家长和孩子一起搞爱国卫生运动”“学校要求家长与子女共同完成忆苦思甜报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化的亲子任务骨架。那一代中国家庭拥有的“共同话题”，很大程度上是这些由单位和学校共同供给的政治性集体任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被嵌入到一套以阶级、劳动、集体主义为核心话语的公共叙事之中。

这并不是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庭完全没有“自发的”亲子互动。邻里间的走动、弄堂里的闲聊、几个家庭拼凑的周末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体制骨架的僵硬。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自发的互动，实际上同样高度依赖某种外部结构：它们发生在单位大院的熟人社会之中，依托于共用厨房、公共水龙头、集体宿舍的共生空间，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低竞争压力与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奏。一旦这些外部条件撤出——市场化改革以后，它们确实被迅速撤出——这种“自发”便失去了滋养它的土壤。它不是家庭“能力”使然，而是特定制度条件下的产物。

2.3 市场化时期的学校任务骨架

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解体，劳动力市场形成，住房商品化使居住空间私密化，社区熟人网络瓦解。与此同时，教育市场化和独生子女政策共同催生了以分数竞争为核心的密集型教养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学校任务——作业、考试、竞赛、升学——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劳动骨架、政治骨架与社区骨架，成为中国城市家庭亲子互动的几乎唯一的内容供给源。

这一替代并非一夜之间完成，而是经历了大约二十年（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的渐进过程。在此期间，“辅导孩子学习”从一种少数知识分子家庭的特殊实践，逐步上升为几乎所有城市家庭无法逃避的日常义务。这一上升的动力来自多个方向：课程难度的增加使得多数家长开始感到“不辅导就跟不上”；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所有的教育期望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容错率趋近于零；教辅市场的繁荣为家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任务材料；家长群和家校共育话语则在规范层面将“检查作业”定义为了好家长的标配义务。学校任务骨架，正是在这一多重力量的汇合中，完成了对中国城市家庭晚间时间的全面占领。

由此回看本节的开篇问题：当代的任务寄生性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还是结构位置的延续与变形？答案倾向于后者。中国城市家庭在可追溯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一段“普遍地、制度化地独立于外部任务骨架而自主生成亲子互动内容”的时期。传统社会的劳作骨架、节庆骨架，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骨架、政治任务骨架，市场化时期的学校作业骨架——外部骨架的供给者随历史变迁而更替，但家庭在互动内容的生成源头上被外部机构所组织这一结构位置，始终未变。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有变”。当代的独特之处在于两点。其一，目前的学校任务骨架具有三重传统骨架所不具备的特征：高度标准化（全年级统一进度）、不可协商性（以广播式指令下达）、以及

高利害评价（分数与升学直接挂钩）。这使得家庭对它的依赖更深、更难摆脱，因为“脱离骨架”不仅意味着没有东西可做，还意味着在竞争中落后。其二，传统社会中存在多种并行的骨架——劳作、节庆、宗教仪式、民间故事、邻里往来——家庭可以在它们之间切换，不会因某一种骨架的撤除而全面陷入真空。而当代城市家庭，已被标准化和竞争逻辑逼至只剩下学校作业这唯一一根支柱。当代的危机，不在于“依赖”，而在于“单点依赖”。正是这种单点依赖，使得AI一旦拆掉这根唯一的支柱，整个亲子互动架构便发生塌缩。对这一塌缩过程的具体观察，正是第四节案例部分的任务。

三、时间挤压、议程依赖与任务骨架的隐秘功能

3.1 时间挤压与寄生需求的强化

历史溯源确立了“依赖外部骨架”是一种长期的结构位置。本节转入当代的制度分析，首先处理最硬的一层约束：劳动时间制度。

中国城镇双亲就业群体中，互联网、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事实超时工作制，通过加班费计算基数的压低、劳动监察的被动执法、以及“奋斗者协议”的普遍化，构成了一套将法定工时系统架空的重重机制。其后果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母亲，在工作日与孩子可支配的共处时间，扣除通勤和家务之后，往往只剩一个半小时。在这九十分钟里，她的认知资源和情绪调节能力已被白天的高强度劳动耗竭。已有大量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前额叶皮层在疲劳状态下对杏仁核的抑制能力显著减弱，这使得个体对轻微挫折的情绪反应强度显著升高（Arnsten, 2009）。这意味着，即便她主观上想成为“温和而坚定”的母亲，她的神经系统已经无法支撑这一意愿的执行。

但仅仅指出“时间不够”还不够。真正需要解释的是：在这残存的一个半小时里，为什么家庭总是不约而同地选择“辅导作业”和“检查打卡”，而不是进行那种被心理学家推崇的“情感性陪伴”？制度挤压论的合理回答是：因为劳动时间挤压使得非任务性的互动失去了生存所需的起码时间门槛，它们被自然淘汰了；而任务性的互动因为有事可做、有外部驱动力，反而存活了下来。这一解释已经相当有力。

本文要在此之上推进一层。时间挤压所制造的，不仅是精力的耗竭，更是家庭对学校任务的依赖加深。因为当可支配时间极度有限时，家庭更不可能承担“自主设计互动内容”的高成本——这件事需要心理余裕、需要共同的兴趣储备、需要反复试错，而这些都是被工作榨干的家庭成员已经无力支付的。在那残存的一个半小时里，直接接入学校已经调试好的任务流水线，是家庭在既定约束下唯一理性的选择。于是，劳动制度越挤压，家庭越没有余裕去生成替代互动内容，从而越依赖学校任务；而学校任务越密集，家庭的时间被填得越满，就越没有余裕去生成替代互动内容——一个负反馈的闭环就此形成。这个闭环不是“时间贫困”和“制度性空缺”相加，而是时间贫困催生了更深的寄生性，而寄生性反过来固化了时间贫困的代价。

这便能解释一个被反复观察却很少被深究的现象：许多家长对学校的任务抱怨连天，但她一旦因为某种原因（如孩子升入“无作业班”或学校减负）从任务中释放出来，第二天晚上反而感到一种说不清的慌——她和孩子坐在一起，突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她可以提议一起看书，但一会儿就各自刷了手机；她可以试图聊天，但三句就转到学习，因为那是过去十年里他们之间唯一的公共语言。这种慌不是“能力退化”可以完全解释的——它首先是一个“议程真空”，是一个系统在失去外部输入后必然会出现的暂时失灵。

3.2 任务骨架的构成与隐秘功能

家务是亲子互动的寄生者，那么学校任务系统就需要被重新审视。已有的批判几乎全部集中在“责任转嫁”和“无偿劳动”上，这是必要的，但它只讲出了故事的一半。另一半是：学校在把任务推进家庭的同时，也把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亲子互动骨架推了进去。

这个骨架至少有四项组件。第一，时间组件：每一项任务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今晚写完、明早签字、周末前上传。这些节点把家庭本来散漫的时间切分成若干个有明确终点的“任务段”，使得亲子之间有了“必须坐在一起”的时间硬约束。第二，主题组件：任务附着着具体的认知内容——一道数学应用题、一篇课文朗读、一幅看图写话。这些内容为亲子对话提供了现成的话题，家长不需要从“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这种极易滑向敷衍的开放问题开始，而是可以直接进入一个有标准答案、可纠错、可演示的实质场景。第三，角色组件：任务天然地为双方分配了清晰的角色——孩子是执行者，家长是检查者和辅助者。这种角色虽然功能化，但它避免了亲子之间因角色模糊而产生的那种“在一起但不知道以什么身份在一起”的尴尬。第四，评价组件：任务完成后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对错、分数、老师的评语。这个结果为整个互动过程提供了可分享的情感反馈：做对了，是共同的胜利；做错了，是共同的挫败；但无论哪种，它都是共同经历的。

在这套骨架的支撑下，即便家庭缺乏深厚的情感基础，缺乏自发的共同兴趣，甚至缺乏彼此了解——这在晚婚晚育、高流动性、代际育儿理念断裂的当代中国城市中十分常见——亲子之间依然能够维持一种高度结构化、频率稳定、内容明确的日常互动。这正是“任务寄生性”的正面功能：它为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传统互动脚本的家庭，提供了替代性的互动脚本。家庭或许在情感上被掏空，但在仪式上并未断裂。

然而，这个骨架的寄生特征也正由此显露。首先，它使家庭互动严重单一化。因为只有学校持续输出的任务序列是免费、稳定、合法且不耗费额外心理预算的，家庭自然地放弃了探索其他可能互动议程的努力——哪怕有时间，也不知道除了“看作业”之外还能做什么。这不是家庭的懒惰，而是一种在时间与认知资源双重约束下的理性适应——但适应的代价是，互动的可能性空间被缩窄到只剩下学校任务这一条通道。其次，它制造了一种“任务即关系”的错位：家长往往在潜意识里认定，如果作业做得好，就说明自己陪伴到位、亲子关系良好；如果作业做不好，就说明亲子关系出了问题。于是考试成绩的每一次下滑，都不仅仅是认知的警报，更是一场关系层面的身份危机。当关系的内容全部由任务构成时，任务的产出就成了关系的替身。

再者，学校任务骨架本身是不可协商的，它是由教师按照班级统一进度、以广播式指令下达的。家庭无法根据自己的情感节奏、亲子双方的真实状态来调整任务的难度、频次或形式。一个今天在学校受了委屈、渴望一场安静陪伴的孩子，回到家中面临的仍然是那套由学校预设好的程序；一位今天被工作情绪压垮、仅剩的一点能量只想和孩子安静地挨着坐一会儿的母亲，发现自己必须履行那套程序，否则第二天微信群里就会被点名。互动骨架从“服务关系”反转为“绑架关系”，寄生性从觅食变成了噬主。

3.3 “任务寄生性”的概念界定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正式界定“任务寄生性”的三层意涵。第一，互动内容的来源寄生：亲子间的共享话题和共同活动，其选题、节奏和评判标准主要由外部机构（当前主要是学校）而非家庭内部生

成。第二，互动启机的寄生：在缺少外部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家庭很难自主地从零启动一段有情感浓度的亲子共处；外部任务的截止时间和检查要求，充当着“必须在一起”的强制性理由。第三，互动情感的寄生：亲子间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产生的成就感、被认可感、乃至偶尔的亲密感，很大程度上附着在任务的成功执行之上，而非附着在关系本身之上；一旦任务这一载体被剥离，相关情感也往往随之消散——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感情，而是因为感情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共同在做着的“具体的事”。

需要特别澄清的是，“任务寄生性”并不等同于“家长对学校任务的被动接受”或“强压下的被迫协作”。寄生是一种双向依赖：宿主（学校任务）为寄生者（家庭互动）提供养分，但寄生者的存在也反过来稳定了宿主——正是因为家庭能够承接这些任务，学校才得以持续地以低阻力的方式向家庭转嫁教育责任。家校对任务的共同维系，构成了一种非对称却相当稳固的互嵌结构。以往的分析多聚焦于这种互嵌对家庭的“剥削”面向，本文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本文要强调的是它的另一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种免于“议程空转”的保护——哪怕这种保护本身就是焦虑的来源之一。学校任务之所以能够在家庭中被“顺利执行”，不仅因为制度权威，更因为它填补了一个真实的需求：家庭在心理上与实际上都缺乏替代性的互动内容储备。

这个概念还为我们重新定位“家校共育”话语提供了一把钥匙。家校共育的理想状态，是学校与家庭各自发挥优势，共同促进儿童发展。但在任务寄生性的现实结构中，它常常滑向一种“任务供给者—任务寄生者”的非对称关系。学校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单向输出任务，不仅仅因为它掌握着制度权威，更因为它抓住了家庭已经丧失自主生成互动议程能力的软肋。家长不是不想拒绝，而是拒绝之后不知道用什么来替代。学校的“输出”越方便，家庭的“自产”就越萎缩；家庭越萎缩，对学校输出的依赖就越深。这才是家校共育困局最底层的逻辑。

四、骨架断裂时：两个家庭的发生学追踪

以上两节的论述分别从历史和制度维度建立了“任务寄生性”的理论框架。本节引入两个真实家庭的微观案例，追踪它们在“作业辅导被AI替代”前后三个月内的亲子互动变迁。但本节的目的不是用案例“印证人”前面的理论判断，而是进入家庭内部的微观过程，追问：当任务骨架被AI拆除后，家庭内部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挣扎、试探、失败是如何展开的？这些失败反过来如何强化了寄生结构本身？这一追问，将使“任务寄生性”从一个静态的结构诊断发展为一种能够容纳主体挣扎的发生学判断。

两个案例来自笔者2023年至2024年间在上海和杭州进行的城市家庭亲子互动追踪研究的田野记录。为保护隐私，家庭基本信息做了匿名处理。

4.1 案例一：上海，母亲李某，儿子小杰（小学四年级）

背景与寄生态

李女士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丈夫是医疗器械销售，两人周均工作时间均在55小时以上。在小杰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每晚的亲子时间高度结构化地围绕着学校作业展开：七点半李女士到家，吃饭时间“今天作业有哪些”，八点开始陪小杰坐在书桌前，逐一检查数学试卷、听写英语单词、在语文朗读课文上签字。这个过程常常夹杂着冲突——小杰磨蹭，李女士声音升高，小杰哭，李女士懊悔，十点母子在疲惫中和解。在访谈中李女士反复说：“虽然累，但至少我知道晚上该干什么。”

这句话值得被仔细对待。“知道该干什么”——这是任务骨架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在李女士的自述中，辅导作业虽然辛苦，但它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每晚有一个明确的议程，一套清晰的操作序列，一个可预期的时间结构。这种确定性并非没有代价——它伴随着冲突、疲惫和偶尔的自我厌恶——但它在情感上至少是“有底的”。李女士知道自己在“当妈妈”这件事上，每晚确实在做着些什么。学校任务不仅填满了时间，也填满了“好母亲”这一身份所需要的行动素材。

2023年9月，李女士为小杰购买了一个AI学习终端的年费会员。该终端覆盖了数学、英语两科的全量题库，提供逐题讲解、错题自动收集与同类题推送功能。此后三个月内，这个家庭晚间亲子互动发生了以下可被观察到的变迁。

第一个月：从挣脱到茫然

李女士显著减少了讲题时间。小杰遇到不会的题，自己打开AI终端听讲解；李女士改签字的角色为“在旁边坐着，偶尔看一眼”。她最初感到解脱：“终于不用吼了，嗓子都好了。”

但这个月里，她与儿子之间的有效对话时间——不计“书包收好了吗”“快去洗澡”这类功能性指令——从之前每天平均约四十分钟（主要围绕作业展开）下降到十五分钟左右。这二十五分钟的沉默，并非因为双方“不想说话”，而是因为“没有说话的具体理由”。在任务骨架下，对话是任务的自然副产品：“你这步算错了”——这是一个有明确指向、有认知内容的启动句。一旦这个启动句被AI接管，李女士发现自己忽然失去了开启对话的第一个话头。她可以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但这是开放式问题，小杰用一个“还行”就能封死后续对话。而在任务的语境下，“还行”从来不成立——答

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纠错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话的延续。任务骨架与情感接触之间的相互纠缠，在这里第一次显现出其脆弱性：当认知传输被AI拆掉，附着其上的情感接触也一并丧失了落点。

第二个月：自我审判的启动

李女士开始感到不适。她描述道：“我就坐在他旁边，但我不知道要干嘛。他戴着耳机听AI讲，我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见。我想跟他聊聊天，但除了‘听懂了吗’好像没什么好问的。他头也不回地说‘听懂了’，就又做题去了。”

“不知道要干嘛”——这五个字是任务寄生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精确签名。请注意李女士的处境：她的时间没有变少（她还是那个七点半到家的母亲），她的意愿没有消退（她主动坐在孩子旁边），她甚至做出了尝试（“我想跟他聊聊天”）。但她手中没有可用的启动材料。她提出的“听懂了吗”本质上是一个封闭性问题，它的底层句法是任务骨架的残余——她仍然在用“认知检查”的方式试图发起对话，而孩子则以“听懂了”快速终结对话。寄生的深度恰在于此：李女士不是“不想互动”，而是她的整套互动语言已经被任务骨架塑造成了以“检查-反馈”为唯一语法。当检查功能被AI接管，她的互动语言便失去了其唯一的语法结构。

李女士曾经试图在孩子做完作业后提议一起看一部纪录片。第一次尝试以她自己的中途离场告终——工作电话打断了观看。第二次尝试则遭到小杰的明确拒绝：“我想自己看游戏视频。”这两次失败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缺乏毅力”或“孩子不配合”。更深层的问题是：提议“一起看纪录片”本身，是李女士试图从零生成一个互动议程。这个提议缺乏学校任务所具有的那种强制力——没有截止日期，没有检查者，没有不完成的后果。在这种完全由自主意愿驱动的议程中，任何外部扰动（工作电话）或内部不同步（孩子的兴趣不匹配）都会轻易瓦解它。学校任务之所以能持续运转，恰恰因为它具有家庭自主议程所无法复制的结构性约束力。

第三个月：从议题焦虑到身份审判

一次语文单元测试小杰考了七十八分。李女士当晚大发雷霆，训斥的内容却不再是知识性错误，而是一连串与分数无关的自责式宣泄：“我这一学期都没怎么管你，你看就退步了吧！”“我是不是太不负责了？”“我买那个东西是不是害了你？”

在后续访谈中，李女士自己分析道：“其实我知道语文考不好跟那个AI没多大关系，他语文一直不稳定。但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做，他考砸了我都不知道是谁的错——以前至少是我教过他，我知道他哪里卡住了。现在他的学习跟我没关系了，但他考不好我还是焦虑，因为老师还是会找家长。”

这一段自述，展示了一个关键的发生学过程：AI没有减少李女士的焦虑，而是将焦虑从“认知任务领域”移到了“身份认同领域”。在任务骨架下，成绩的起伏有一个明确的归因路径：如果小杰考砸了，李女士可以定位到“那道题我没讲清楚”“那一章我们练得不够”——这是可指认、可操作、可修复的归因。但在AI接管之后，这个归因路径消失了。李女士无法确认自己在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做了什么”，因而也无法在失败时为自己输送一个“我做得不够好但至少我知道哪里不够好”的心理缓冲。她遭受的直接是更底层的打击：“我什么都没做”——不是针对某次考试的自我批评，而是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这一身份的整体性质疑。

这也就是为什么她的焦虑在第三个月具体化为一种强迫性行为：她开始在AI终端上检查小杰的学习报告（终端提供“今日学习时长”“错题分布”“薄弱知识点”等数据），并以此作为与小杰的“新话题”。“你今天在概率那一章错了五道题，拿出来给我看看”取代了“你先把数学写完”。

但这种新话题，正如李女士自己承认的，比原来的辅导更干涩：“以前讲题，我不会了我也会承认不会，然后我们一起去查——那个过程虽然慢，但我是真的。现在我看他数据，我就像他领导在查KPI，我跟他说话的感觉完全变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李女士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寄生节点——把AI的数据报告当作旧任务骨架的替代品。但数据报告不具备旧骨架的核心特征：它没有老式辅导中那种即时的、身体在场的、双向的认知摸索过程。老式辅导中，李女士的一句“这道题我也不会，咱们一起查”，不仅传递了知识，也同时传递了“母亲也是一个学习者”、“面对困难可以共同应对”等大量非认知信号。这些信号在旧骨架中不受注意，却构成了亲子情感接触的实质性内容。AI数据报告则将这些信号全部滤掉了：剩下的只是“错题数”“薄弱点”“学习时长”这类量化指标，它们只支持一种关系模式——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李女士的感受——“像领导在查KPI”——恰恰准确地命名了这种关系的属性转换。她的短期应对不仅没有填补互动真空，反而将残存的互动推向了更干涩、更异化的方向。

李女士的整个经历，可以被概括为一个三阶段的序列：（1）挣脱——从任务的重压下暂时解脱，体验到解放感；（2）茫然——发现解放之后，手边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互动材料；（3）审判——在茫然中被外部评价（考试成绩、老师找家长）击中，将茫然转化为对自身身份的攻击。这个序列不是李女士个人的心理特征，而是任务寄生性在AI技术介入条件下的典型展开路径。

4.2 案例二：杭州，父亲周某，女儿小琪（小学二年级）

背景

周先生是建筑设计院的项目负责人，妻子是全职母亲。在小琪一年级时，辅导作业主要是妻子的职责。2023年10月，妻子因父亲重病需回老家照料，周先生临时接手晚间育儿。他的工作强度极高，常常晚上九点后才能到家。此前他几乎不参与辅导，对女儿的学习进度不了解。为了应对，他在妻子建议下购买了一个AI伴学工具。

头两周，周先生发现女儿已能熟练使用AI完成基础练习。他到家后只需问“作业做完了吗”，小琪答“做完了”，他便签字。他感到满意——高效率，低冲突。但第三周的一个晚上，他提前回家，发现小琪独自坐在书桌前，AI平板在播一个讲解视频，但小琪的眼睛并没有看屏幕，而是在反复折一张纸。周先生坐下来问她在做什么，小琪说：“爸爸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听了。”周先生问她：“那你想干什么？”小琪想了很久，说：“我想你陪我玩，但不知道玩什么。”

成人互动语言的贫困

周先生在访谈中把这一刻描述为一次冲击：“我突然意识到，她每天晚上都是这样一个人坐在这里。我以为她‘在做作业’，但其实她可能已经不在做了——她只是在等时间过去，等到可以睡觉。我给她买了那个平板，等于把她一个人扔给了平板。”

小琪的“不知道玩什么”，比李女士的“不知道要干嘛”更令人不安。一个七岁的孩子，在被明确询问“你想干什么”的时候，给出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愿望（如“我想画画”“我想去公园”），而

是“我想你陪我玩，但不知道玩什么”——这意味着，她已经内化了一种互动的无助感。她“想要”陪伴，但她无法将这种愿望翻译为一个具体的行动提案。这不只是小琪个人表达能力的局限；更有可能的是，在她迄今为止的亲子经验中，“和大人一起做什么”这件事，一直是由外部任务来定义的。她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主要通过“作业”这个中介物来运转。当这个中介物被置换为一块平板，关系本身便失去了其唯一的内容载体。

周先生此后开始尝试每晚陪女儿下棋或拼图。但这项实践只持续了不到两周。原因很简单：他无法保证每晚都在同一时间到家。建筑设计院的交图周期决定了，他有一半的工作日晚上九点以后才能进门，而那个时间点小琪已经接近就寝。更糟糕的是，当他某一天缺席，女儿便拒绝独自下棋——“她说不想自己玩，就又想看平板。”

这个细节暴露出一个更深的结构性问题：亲子互动内容的生成，不是靠一两次心血来潮的“陪伴”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期、不依赖于单一个体意志的时间架构来承载。学校的作业之所以能日复一日地运转，恰恰因为它有一个外在于家庭意志的、不以任何一方今晚是否“想”做事为转移的强制结构。周先生的下棋和拼图，是依赖于他自己的在场和主动性来维持的——一旦他缺席，这个议程便瞬间坍塌。他的短期应对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父亲”，而是因为他试图以个体的意志去替代一个制度化骨架的功能——而个体的意志，在当代劳动制度的时间压迫面前，是极不可靠的。

周先生最终将这一失败归咎于自身：“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时间，有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当好爸爸。”请注意这个归因的方向——他将一个结构性的议程供给断裂，内化为了对自身人格的审判。这与李女士将孩子的成绩波动转化为“我是不是太不负责了”的自我质疑，遵循着同一种逻辑：当家庭在互动议程上陷入真空时，个体——尤其是被社会规范重度规训的母亲和感到“缺席”的父亲——倾向于将真空体验为自身的无能。寄生结构的断裂，在主体的心理层面被结算为“我不够好”。这一“结算”过程，正是“议程性焦虑”这个概念试图捕捉的核心。

4.3 从案例到判断：寄生结构的再生产

两个案例揭示了同一个深层机制：当外部任务骨架被拆除后，家庭并非没有尝试填补互动真空；但他们的尝试（李女士查AI数据、周先生下棋）依赖于个体的意志、精力与在场——而这三者在当代劳动制度下都是极度稀缺且不稳定的资源。尝试的失败反过来制造了更强的无力感：家庭成员将失败归咎于自身（“我不够好”“我不知道怎么当爸爸”），而无力感则进一步压缩了他们再次尝试的心理空间。寄生的结构，恰恰通过这种“尝试→失败→自我归咎→放弃尝试”的微观循环，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被反复再生产。家庭并非“不想自主”，而是在当代的时间、精力与评价压力的多重约束下，自主已经被结构性地做成了极难负起的重担。

五、AI拆骨：当寄主被技术抽离

5.1 AI介入的特殊性

上述案例为前文的理论判断提供了经验性支撑。本节在此基础上升华，阐明AI技术介入在“任务寄生性”结构中扮演的特定角色。

过去三年间，个性化学习平台、作业辅导机器人、智能错题本等工具迅速普及。它们确实大幅降低了家长在知识讲解上的认知负载。这对家长而言，似乎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担子。

但技术的这类“卸担”，恰好切在了任务寄生性的神经上。辅导作业之所以长期占用亲子时间的核心位置，不仅因为它的认知功能，更因为它理所当然地为亲子接触提供了一个被双方共同接受的“合法理由”。在大多数家庭里，母亲能够自然地坐在孩子身边、触碰他的头发、观察他的表情，并不是因为她说“我们一起聊聊天吧”，而是因为“我给你讲这道题”。讲题这个动作，承载了大量未被命名的情感接触：身体的靠近、声音的温柔与否、错误的包容、不耐烦后的道歉。这些接触的真实发生场，不是聊天场景，而是任务场景。“辅导作业”是一个兼有认知传输与情感接驳功能的复合接口。AI拆掉了认知传输这一半，但同时也把这个接口拆开了，使那剩下的一半——情感接驳——突然失去了可以附着其上的客观动作。

于是家庭遭遇了一种悖论式的空白：母亲不用再辅导作业了，她松一口气，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靠近孩子。她可以提议“咱们一起读本书吧”，但她的神经系统还在工作压力的残余里，她的认知资源已经无多，面对一本需要投入注意力的书，她打不开。她可以提议“咱们聊聊天吧”，但她猛然发现，除了学习和成绩，她已经找不出几句能聊过三分钟的话题。孩子呢，也未必想和她聊——AI讲题比妈妈清楚，又不会发火，他更喜欢。于是母子二人各自拿起各自的屏幕，肉体同处一室，关系已然分舱。这种分舱不是AI制造的，是AI触发的。

5.2 “议程性焦虑”的发生

更精准地说，AI时代的家庭教育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议程性焦虑——它不再仅仅是“孩子学习跟不上”或“我没有时间”，更深层的原因是：“当亲子之间那根由外部任务构成的唯一纽带被技术抽走后，我还剩下什么可做的、可说的、可一起经历的事情，来维系一段被社会规范所要求的‘高质量亲子关系’？”

本文使用“议程性焦虑”这一命名，不是要制造又一个诊断标签，而是为了在经验现象层面精确锚定一个问题域，使后续的发生学追问有一个确切的入口。真正需要追问的是：这种焦虑本身，是在何种规范结构与绩效文化中被“结算”出来的？第四节两个案例已经初步展示了这一结算过程在个体家庭中的微观形态：外部骨架断裂（AI介入）→ 尝试自主生成议程 → 尝试因时间、精力、语言等结构性约束而失败 → 失败被内化为“我不够好”的自我审判 → 审判引发焦虑。本文在此将这一微观过程放回宏观条件中，识别出三层相互咬合的发生条件。

第一层是客观层面的：亲子互动内容的来源在当代已被单一的外部任务系统所垄断——这是第二节和第三节已经充分论证的。

第二层是规范层面的：社会对“好父母”的评判标准在近二十年间发生了显著的内向化转向。在“辅导作业”仍然是可见代价的时代，“好父母”的标准是“你是否为孩子的教育付出了巨大的、可被看见的努力”——深夜陪读、手抄错题、打印卷子，这些都是可展示、可量化、可被家长群体承认的付出证据。但当AI把这些可见代价的感知力大幅削弱之后，“好父母”的评判标准并没有降低，而是转向了更模糊、更难执行的“高质量陪伴”与“情感支持”——而这些恰恰是家庭从未获得过具体操作方法的领域。标准的升高（从“付出努力”到“付出情感”）与手段的匮乏（从“有作业可辅导”到“不知道该做什么”）之间，形成了一个制度化的落差。家长被夹在这个落差之间：她们无法再用旧方式（辅导作业）去满足旧标准（为教育付出可见努力），却又没有被赋予新方式去满足新标准（提供高质量情感陪伴）。焦虑，正是这个落差的必然产物。

第三层是主体层面的：家长内化了这一规范，但缺乏将其转化为具体实践的材料与技能。李女士的“我坐在旁边不知道干嘛”和周先生的“不知道玩什么”，陈述的正是这一层困境。但本文要强调的是，这种“不知道”不应被理解为个人能力的缺乏，而应被理解为一种“互动语言的系统性贫困”。正如第八节将要论证的，一个被任务化生存所深刻改造的成人，其互动语言已经被窄化为“检查—反馈”“指令—执行”“监督—汇报”等少数几种语法。当她被要求切换至“情感性陪伴”的语法时，她手上没有可用的词汇和句式。这并不是她的错，却由她独自承担代价。

这三层条件的叠加，使议程性焦虑成为了一种既由客观结构制造、又被主观规范放大、且缺乏缓解出口的复合型焦虑。它不是“心理调适”能够解决的——因为它的根源不在个体的心理，而在个体所站立的、被掏空了互动议程土壤的制度位置。

5.3 与“制度性空缺”的分际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辨明“时间贫困”、“制度性空缺”与“任务寄生性”三者的分际。时间贫困说：家庭缺时间。制度性空缺说：家庭缺惯习。任务寄生性说：家庭从来就没有独立于外部供给的互动议程；它的“缺惯习”不是一种退化，而是一种原发性缺失——在当代中国城市的具体制度条件下，家庭从未被赋予发展自主互动议程所需要的那一组结构性前提（稳定的社区支撑、可预期的闲暇时间、低利害的试错空间、多元的互动脚本供给）。

区分这三者的实践意义十分清楚。如果相信时间贫困，解决方案是“减少工时”——把时间还给家庭，互动自然会发生。如果相信制度性空缺，解决方案是“培养惯习”——通过教育、咨询、社区工作坊，帮助家庭“学习”如何互动。但如果是任务寄生性，那么上述两种方案都是必要而不充分的。给一个已经丧失了议程能力的家庭一堆空白的的时间，并不会自动令它生成有情感厚度的共同活动——第四节的两个案例已经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时间空出来了，但空出来的时间迅速被屏幕或茫然占据。同样，向一个其互动语言已经被任务骨架深刻塑形的家庭传授“如何高质量陪伴”的技巧，无异于给一个没有砖块的人上建筑学课程——她知道盖房子很重要，也知道了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她的地上没有砖。

这正是本文与“制度性空缺”论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正确地诊断了“缺”，但它预设了一个“不缺”的参照状态（“土壤”），并认为政策的方向是恢复土壤。而本文的主张是：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从未拥有过那种被想象为“自然土壤”的制度化互动能力；因此政策的方向不是“修复”，而

是“建”——为家庭搭建新的骨架，而不是等待家庭从内部生出它从未拥有过的东西。这一区别，将在第六节回应“习得可能”挑战时得到更充分的展开。

六、回应“习得可能”：为什么自主之路走不通

6.1 最强反方的挑战

上述论证至此，一个最强有力的反方观点必然浮现。它可以被表述如下：

“即便接受你关于‘中国城市家庭历史上从未独立于外部骨架’的判断，也无法得出‘家庭不能在未来习得自主互动能力’的结论。人是具有学习和适应能力的行动者，而非仅仅被动寄生于结构的木偶。如果政策提供足够的时间（工时缩短）、资源（社区支持）和引导（家庭教育培训），家庭完全有可能在代际内发展出非任务性互动的惯习与能力。你的案例只追踪了三个月，且案例家庭已被高强度的任务制度所深度塑形——三个月的观察期太短，不足以否认长期习得的可能性。你的判断过于悲观，过于结构决定论。”

这是一个无法被回避的挑战。如果本文不能有力地回应它，那么“任务寄生性”就可能被降格为一种对当前状态的精确描述，而非一个经得起反驳的理论判断。本节试图以最大的诚意来面对这一挑战，并从当代制度结构的角度论证：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家庭层面的“自发习得”并非在抽象意义上不可能，而是被多重制度性阻力压缩到了极为困难的境地；“公共骨架供给”的方案，正是建立在对这些阻力的诚实承认之上，而非对家庭能力的否定。

6.2 为什么说这一挑战在当前制度条件下难以成立

首先必须澄清：本文并不否认人在抽象意义上具有学习新关系模式的能力。人类的可塑性是社会学不必质疑的前提。本文质疑的是：在当代的具体制度条件下，将这一抽象能力转化为普遍的家庭层面实践，所需的结构性前提是否具备。

本文认为，至少缺了四样东西。

第一，时间结构不支持。 几项权威的时间利用调查反复显示：中国城镇双亲家庭的劳动时间至少在近十五年内没有出现显著的总体下降。即便一部分互联网企业推行了“965”，劳动强度的监督与绩效考核的密度反而在同步上升。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劳动者而言，“不加班”并不意味着“有闲”——它往往只意味着把工作带回家，或者在工作时间里被压入更密集的任务流。即便在某种政策干预下工时有所缩短，只要劳动仍然以高强度认知输出为主体特征，那么被还给家庭的“时间”，仍然是情绪耗竭后的残余时间——疲惫的家长 and 一天学校生活后同样疲惫的孩子，在十九点至二十一点这个窗口里，彼此剩下的认知与情感资源都已接近触底。这个时间碎片里的“高质量陪伴”，在原则上当然可以“习得”，但问任何一个认知心理学家，一个前额叶处于疲劳状态的成人能否在短期内掌握一套全新的关系语法——答案恐怕不会乐观。

第二，社区支撑瓦解。 在第二节的历史溯源中，本文已经指出：传统社会的亲子互动骨架之所以能够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共同体的支撑——多户杂居的居住形态、邻里之间的非正式互助、节庆仪式的集体组织。这些支撑在现代城市中几乎已全线瓦解。城市家庭的居住空间是封闭的；邻里关系是疏离的；育儿已经从社区的共同事务转变为一个家庭在私密空间中的独自焦虑。在这种孤独的育儿处境下，期待家庭自身在闭门之中自行摸索出一套全新的互动模式，是对家庭提出了连传统共同

体都未必能单独完成的极高要求。习得新能力需要场域——一个安全的、低风险的、可以反复试错而不必担心被评判的空间。当代城市家庭最缺的，恰恰是这种场域。

第三，评价压力全方位渗透。当代城市家庭的亲子互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始终处在一套密集的评价体系之下：学校的成绩排名、家长群里的隐性比较、亲戚聚会时的关切询问、社交媒体上“别人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妈妈”。这种评价的全面渗透有一个直接的实践后果：任何不以可见产出为目标的互动行为（如“就是一起发发呆”“漫无目的地闲逛”），都在心理上被标记为“低效”甚至“浪费时间”。一个家长如果某天晚上没有检查孩子的作业，而是和他一起在小区里看了一阵月亮，她内心浮现的很可能不是满足感，而是隐隐的不安——“今晚是不是什么都没做？”这种不安不是她个人的认知局限，而是她所沉浸的那套评价体系在借她的自我审判机制发声。期待家庭在这样的评价环境中自发地发展出不以任务为导向的互动能力，等于期待一棵树在持续的酸雨中正常生长。

第四，成人自身的互动语言已被任务化生存所深刻改造。这是最关键、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本文所讨论的“亲子互动能力”，其本质是一种关系语言——知道如何开启一段不经由外部议程中介的共处，知道如何在一段无确定目标的共处中共同发现意义，知道如何容忍开放式互动中必然伴随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但这种语言不是一种孤立的“技巧”，它需要在成人自身的日常生活中被反复使用才能得以维持。然而，当代城市知识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本身，恰恰是被任务化、指标化、效率化深度塑形的。她的工作由KPI定义，她的休闲由算法推荐，她的社交由日程表管理。对于许多这样的成人而言，“没有明确产出的共处”在她的整个生活经验中都是一种陌生的存在方式。她不仅在亲子关系中没有这种语言，她在自己的夫妻关系、友谊、甚至与自己的独处关系中，同样缺失这种语言。期待她在成为母亲之后，在无人教授、无场域练习、无示范参照的条件下，自动生长出这样一种语言——这已经不只是乐观，而是一种对成人内心真实处境的忽视。

综合以上四点，本文对“习得可能”的回应并非“人类没有学习能力”，而是：学习能力的实现需要一组结构性前提——可预期且充沛的时间、低利害的试错空间、社区的共同在场、以及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关系语言的积淀；而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普遍处境下，这组前提几乎在每一个维度上都被掏空了。所谓“习得”，不能被简化为一个意志问题或教育问题；它是一个制度条件问题。

6.3 “公共骨架供给”方案与“习得”观的根本区别

厘清了这一点，也就厘清了本文的“公共骨架供给”方案与“期待家庭自发习得”的根本区别。

后者的逻辑是：“给家庭足够的时间和资源，他们自己会找到出路。”它的优点是尊重家庭的自主性，但它的隐含前提——家庭已经具备或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能够自行发展出生成互动内容的能力——如上所述，在当代制度条件下极难成立。更危险的是，这一逻辑在实践上极易滑向对家庭自身的道德要求：如果给足了时间和资源，你还是没学会怎么高质量陪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这无异于把制度性阻力的后果，再次转嫁为个体家庭的失败。

而“公共骨架供给”的逻辑是：“承认家庭在互动内容的生成上需要外部结构，这不是家庭的失败，而是既成的、由长期历史过程塑造的结构条件。公共责任，在于为家庭提供多元、可选、低利害的外部骨架，让家庭可以在这些骨架的支撑下积累互动经验，并有可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试错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互动语言。”它不是“替代家庭能力”，而是承认能力的培育需要脚手架，而脚

手架的供给本身就是公共事务。二者的差别，不是实操路径的微调，而是对家庭处境的基本判断的不同。

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设计得当的公共骨架，其目标不是让家庭永远依赖这个特定的骨架，而是通过长期的有支撑的实践，逐步降低家庭对单一骨架的寄生深度，使之有可能在多元骨架之间切换，并在这一过程中缓慢地形成一套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外部供给的、家庭的内部互动语法。这个目标遥远而艰难，但至少它是诚实的——它不假装“土壤”曾经存在过，也不幻想“土壤”会自己长回来。

6.5 与科尔曼「家庭内社会资本」的对勘：存量耗散与能力从未被赋予

第六节回应了「自主互动是可以习得的」这一乐观假设。但要让「任务寄生性」这个命名站得住，还必须正面处理一个几乎与它同域的经典框架，否则本文的判断会被整体读成它的一次重述。

这个框架是科尔曼的家庭内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创造》（Coleman, 1988）里，科尔曼区分了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并指出一个关键事实：父母拥有高人力资本，未必转化为子女的成就——中间必须有社会资本，也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结构。他用「结构性缺口」（structural deficiency）来描述那些父母在场但关系不发生的家庭，并明确指出，父母的物理在场不等于社会资本。本文第三节所描述的「时间挤压导致互动稀薄」，在这个框架里已经有位置。此外，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关于家庭内沟通编码的分析，也已经说明了家庭互动的形式如何被外部社会位置结构化。

本文承认这一占位是真实的、并且是大面积的。若本文的主张只是「亲子互动的质量下降了」或「父母在场但关系没发生」，那么它没有超出科尔曼 1988 年的判断。

剩余在一个更前面的位置：**科尔曼的框架预设了一种存量**。社会资本是可积累的、可耗散的——它默认家庭内部本来有一套能够生成关系的机制，只是被时间挤压、家庭结构变动、代际流动等因素侵蚀了。他的诊断因此天然指向修复：把父母的时间还给家庭，资本就能重新积累。本文提出的判断与此相悖：**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子互动，不是曾经拥有独立生成议程的能力而后失去了它，而是在现代公私分离、双职工全职劳动与公立教育扩张同时到位的历史条件下，从未被赋予发展这种能力的机会**。它自诞生之日起，日常节奏、话语主题与情感接触的时机，就是由学校持续供给的任务系统来编排的。因此它不是一个被耗散的存量，而是一个**从未建立的存量**；不是土壤板结，而是这株植物一直长在寄主身上。

这个区分决定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方向，也因此可以被裁决。社会资本框架的自然预测是：增加父母与子女的共处时间，互动质量随之提升——因为资本重新开始积累。本文的预测在一个特定条件下与它方向相反：**在外部任务系统被抽走或显著削弱的条件下，单纯增加共处时间不提升互动质量，反而升高冲突频次**——因为家庭获得的是时间，不是议程；而一段没有议程的共处，会迅速退回到唯一被双方熟练掌握的脚本，也就是学习检查。若在任务系统削弱期，共处时间与互动质量呈稳定正相关且冲突不升，本文的核心命名失败，「任务寄生性」应当被并回「社会资本存量不足」。

七、从修复土壤到搭建骨架：政策取向

7.1 前提的诚实

劳动时间制度的刚性仍是最需要被松动的第一块板岩。如果一位母亲仍然每晚八点才到家，任何关于“高质量陪伴”的指南在她身上都是嘲讽。推动劳动监察的有效执法、严格超时加班的法律责任、探索工时账户和弹性工作安排立法——这些是使家庭拥有起码的时间-精力预算的不可绕过的前提。

但本文的区分在于：承认时间增加是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并进而主张，公共政策必须同时担负起“互动议程供给”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主动、系统地为家庭提供新的、不同于学校任务性学习的公共互动骨架，去替代那个正在被技术拆解并已经被批判为过度压迫的旧骨架。这不是恢复土壤，而是寻找新的支撑——一个更健康、更多元、更可选择的支撑。

在提出具体路径之前，有必要诚实地承认这一政策取向面临的现实阻力。第一，财政约束：设计、运营和维护社区层面的公共互动项目，需要持续的财政投入，而在当前地方财政普遍紧张的情况下，这一支出很难被优先考虑。第二，社区治理能力的失衡：不同城市、不同社区的基层组织能力和专业人才储备差异巨大，统一的政策设计往往在落地时被地方治理能力的差异所分化。第三，商业平台的替代风险：另一种更可能的路径是，AI工具本身演化为一套新的寄生骨架。第四节中李女士查AI数据的行为，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围绕AI生成的学习报告、推荐内容与个性化任务，亲子之间可以形成一种新的、同样外部化的互动脚本。这种脚本的寄生性质可能更隐蔽——它看起来是“科技赋能”，但它仍然没有让家庭触及互动内容的自主生成。论文指出这一风险，不是为了悲观地否定AI，而是为了强调：公共骨架的供给不能完全托付给商业平台。资本的流量逻辑和变现需求必然扭曲议程设计的初衷——一个被设计来促进亲子协作的应用，很容易在竞争中滑向刺激成瘾、贩卖焦虑。公共骨架的“公共性”正在于：它不以商业逻辑为驱动，而是以家庭的实际互动需求为依归。

这些阻力的存在意味着，本文提出的“公共互动骨架供给”并非一个可以速成的技术方案，而是一个需要长期制度建设的战略方向。但指出困难恰恰是为了避免政策建议沦为乌托邦——只有在承认困难的条件下讨论路径，才是负责任的学术判断。

7.2 三条供给路径

在此前提下，这种公共互动骨架的供给，可以沿三条路径展开。

第一，在社区层面，仿照过去少年宫和科技站的某些成功经验，设计周期性的、非学科类的“亲子共做项目”：如家庭园艺、社区微更新提案、亲子口述历史采集、街区自然笔记等。这些项目的共同特征是：有明确的任务产出，从而为家庭提供结构性的共处理由；但任务的评判标准不同于学业考试，不以竞争排名为导向，而是以协作过程的记录和分享为核心。

第二，在学校层面，改造现有的“综合实践”类作业，使之不再成为变相的家长代劳负担，而是设计成必须由亲子共同讨论、分工、外出、记录才能完成的真实任务，例如“设计一条家庭周末徒步路线并制作图文指南”，并把评价重心从成果品相转移到亲子互动过程的呈现上。这类任务的关键设计原则是：任务的难度应当主要由成人-儿童协作本身产生，而非由家长单方面代劳完成；任务应当具备

开放的结果而非标准答案；任务的完成周期应当允许家庭根据自己的时间节奏灵活安排，而非以统一的截止日期强制同步。

第三，在数字基础设施层面，鼓励开发面向家庭的“半结构化互动平台”——不是又一个亲子游戏应用，而是一种提供任务框架但留有大量空白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填充的数字空间，比如一个能自动生成“本周家庭探究问题”并根据执行情况调整难度的家庭AI助手，它的设计逻辑不与学业成绩挂钩，而是与家庭自选的兴趣领域（烹饪、观鸟、历史遗迹）对接。这类平台的公共性在于：它不追求商业化的用户黏性，而是追求“用后有收获、可以随时离开”的轻度体验；它的设计应当由教育学者、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和社区工作者共同参与，而非单纯由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决定。

以杭州一个社区图书馆自2021年起试行的“亲子共读创作计划”为例，该项目每两周发布一个开放式主题（如“我们家最老的物件”“如果街角那棵树会说话”），邀请家庭共同完成包括访谈、查找资料、图文创作在内的小型研究项目，并在社区内展示和分享。参与该计划的二十余组家庭中，多数在初期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任务惯性”——家长反复询问“有没有评分标准”“要不要评奖”“做不完会不会被批评”。但在运行一年后，部分家庭开始出现自发延伸：有家庭将主题延续为家庭内部的长期小项目，有家庭开始主动提议新的主题。这一案例虽规模有限，但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新型公共任务骨架”的可行性：当外部骨架持续提供结构而不过度强调评价时，家庭有可能在新的互动议程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内容生成能力，而非永久停留在寄生状态。

7.3 道德话语的松绑

这个取向的一个衍生命题是，它同时意味着对家庭道德话语的一种松绑。如果公共政策可以公然宣布：“家庭本来就需要外部骨架才能有效互动，这不是失败，而是常态”——这一宣告并非要将“寄生”升格为一种不可改变的宿命，而是为了卸下那道迫使无数家长在私下里自我审判的道德枷锁。当“我不需要天然知道如何陪伴我的孩子”成为一个被社会承认的公共事实，家庭就可以从那种“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从内部生出互动内容”的孤独压力中释然。她可以坦然地说：“这周我们还没一起做社区自然笔记项目，我们去吧。”亲子互动就从一种被强制的内在义务，转化为一种可选的公共实践。这种转化本身，就是焦虑的一条解索。

八、结论与证伪

本文围绕一个核心概念展开：当代城市家庭的教育焦虑，最深处藏着一个“任务寄生性”结构——亲子互动长期依赖学校等外部机构供给的任务骨架来组织和维持；这一结构并非当代独有的突变，而是中国城市家庭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始终由外部骨架（传统劳作骨架、单位政治骨架、学校作业骨架）所组织的结构位置的当代延续；当代的独特性在于骨架的单一化、标准化与高利害性，使得家庭对它的依赖更深、更难挣脱；当这一骨架中的关键节点（如辅导作业）被AI等技术撤除，家庭立刻暴露在互动议程的真空中，而社会对“自主亲密”的规范性要求有增无减，议程性焦虑由此引爆。

这一判断不否认劳动时间制度的挤压，也不否认制度性空缺所揭示的关系惯习缺失，但它试图将这些现象再往底层推一级：那些看似“缺失”的东西，也许从未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普遍能力存在过；我们一直试图回去的“自然家庭”，在从传统到当代的多重制度力量（妇女就业、单位制、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市场化、劳动弹性化、AI技术渗透）的反复塑形下，早已被重组为一副必须依靠外部骨架才能站立的姿态。把“寄生”说破，不是为了指责家庭的脆弱，而是为了卸下那副必须“靠自己站立”的道德枷锁，并诚实地面向一个更务实的问题：既然旧寄主正在瓦解，我们应该一起选址、打桩，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建造新的骨架。

本文同时诚实交代其论证的边界。第一，本文聚焦于城市知识劳动者双亲家庭。这一群体的“任务寄生性”最为典型——他们有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教育焦虑的规范性压力、以及相对缺乏传统社区互助网络——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本文的判断不能直接外推到其他阶层或家庭形态上。在乡村家庭、流动人口家庭、或三代同堂的扩展家庭中，亲子互动的议程供给可能来自传统、亲属网络或社区而非学校，它们的寄生结构与寄生对象可能有所不同。第二，本文的案例材料来自上海和杭州两个一线城市，其家庭时间挤压程度、教育竞争强度和AI工具的渗透率在全国城市中处于较高水平。在二三线城市或县域家庭中，“任务寄生性”的形态可能是另一种样貌——例如，替代学校的寄主可能是培训机构、托管班或隔代照料者，而非AI。第三，本文的历史论证（第二节）主要依赖一系列相关领域研究的间接证据与合理推断，而非关于中国城市家庭日常亲子互动模式的系统一手史料。这一点上，本文的论证更接近于一个基于既有研究的历史社会学推断，而非严格的历史学证明。未来的研究若能对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家庭亲子互动内容的变迁进行更系统的经验梳理，将为本文提供更坚实的支撑——当然，也可能修正本文的某些判断。

本文给出的证伪条件如下：假如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城市知识劳动者家庭的劳动时间制度没有发生实质性松动（周均工作时长与弹性度不变），亦无任何系统的公共互动议程供给（如大规模的社区亲子项目或学校非知识性任务改革），仅凭AI技术的自然渗透和既有的心理辅导、观念引导，亲子间非任务性共同活动时间出现显著、可测量的增长，并伴随家庭教育焦虑水平的对应下降——则本文所诊断的“任务寄生性”就不是决定性的结构。换言之，如果在没有外部骨架替代供给的条件下，家庭确实能够仅靠“向内求索”或“技术赋能”而自发地走出议程真空，那么本文的核心判断应当被撤回。

但本文并不预期这一情景会出现。恰恰因为它是可被未来经验事实推翻的，它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学术判断，而非一堆不被允许犯错的修辞。而如果本文的预判被未来的实证研究证实——即在外骨架被拆除后，家庭在没有替代骨架供给的条件下持续处于互动真空并焦虑加深——那么本文所要促成的，

就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判断的成立，更是一整代教育政策和家庭伦理话语的转向：从“教家庭如何向内寻找亲密”，转向“为家庭向外寻找可依靠的骨架”。

由此，本文的结论并非一个封闭的诊断，而是一个开放的发生学起点：既然我们已经识别出，亲子互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任务寄生性”这一结构所组织，那么下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本文留待未来研究的问题——便是：在何种条件下，这种寄生结构可以被松动、重组，甚至转化为一种更健康、更多元的共生形态？如果当前的“寄生”意味着家庭在互动内容的生成源头上被单一外部机构所垄断，那么未来的共生可能意味着：家庭可以有选择地在多元公共骨架之间切换，并在长期的、低利害性的共同任务实践中，逐渐生长出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寄主的、属于自己的互动语言。这漫长，也艰难，但它是本文愿意押注的方向。

九、本文禁止什么

第八节给出了本文的结论与一组证伪线索。本节把它们收紧为可裁决的断言。

主判据：自然实验+三臂设计。利用作业总量政策性削减或长假期这两类外部任务系统被削弱的时段，招募城市双职工家庭（每组不少于四十户），为期十周。甲臂不做干预（任务系统削弱，共处时间自然增加）。乙臂做**时间干预**：额外增加每周五小时结构性共处时间，但不提供任何议程。丙臂做**议程干预**：不增加共处总时间，只提供一套与学业无关、由家庭自选并需共同产出可讲述叙事的活动议程（如共同修理、共同烹饪一道需多次尝试的菜、共同完成一次城市徒步记录）。

本文预测：**丙臂在互动质量上显著优于甲乙两臂，乙臂与甲臂无显著差异，且乙臂的亲子冲突频次显著高于甲臂。**社会资本框架预测乙臂优于甲臂。若乙臂优于甲臂且冲突未升，本文失败。

观测量。互动质量=每周由家庭独立录制的两段十五分钟自然互动中，「非学业性共同议题」的持续轮次（一个话题在双方之间往返三轮以上记为一次持续）。次级观测量：可讲述共同叙事的产出数（由家庭成员各自独立回忆当周共同经历，取双方均能复述的事件数，以此排除单方叙述）。冲突频次由每日简短日志记录。录像编码由两名编码者独立进行，**Krippendorff $\alpha \geq .80$ 方可进入分析**，未达标批次整批弃用。

本文禁止以下情形（任一成立，本文即被推翻）：

- （一）在任务系统削弱期，共处时间与互动质量呈稳定正相关，且亲子冲突频次不上升；
- （二）乙臂（只给时间不给议程）与丙臂（只给议程不加时间）在互动质量上无显著差异；
- （三）在从未依赖学校任务系统的家庭样本（如长期在家教育者）中，同样观测到议程生成能力的缺失；
- （四）议程干预的效应完全由新奇性解释——检验方式为在丙臂内追加一组内容每周更换的高新奇性活动与一组重复同一活动的低新奇性活动，若只有前者有效，则本文所说的「议程生成能力」应被重判为新奇刺激；
- （五）历史部分的核心断言被证伪，即能够找到中国城市家庭在公私分离与公立教育扩张完成之前，普遍具备独立亲子互动议程的直接证据（如口述史或家庭日志材料显示的稳定非任务性共同活动）。第五条最为关键：本文的历史命题是「从未被赋予」，只要证明它曾被普遍拥有，整篇论证的地基就塌了。

本文不主张什么。第一，本文不主张所有家庭都处于寄生状态——存在少数已发展出独立议程的家庭，第四节的对照个案正是它们。第二，本文不主张学校任务系统应当被取消——本文指出的是依赖的代价，不是供给的错误。第三，本文不主张增加共处时间无益——本文主张的是时间不是充分条件，且在无议程时会产生反效果。第四，本文的历史追溯限于中国城市家庭，不主张对农村家庭或其他社会同样成立。

修订说明 本文经两轮编辑性提升：一轮新增 6.5 节，与科尔曼「家庭内社会资本」及伯恩斯坦编码理论正面对勘，把本文的剩余从「存量被耗散」收窄为「能力从未被赋予」，并给出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二轮新增第九节「本文禁止什么」，给出自然实验+三臂设计的主判据、观测量与编码准入标准、五条证伪情形（含直接针对历史命题的第五条）及四条「本文不主张什么」。原稿的核心命名、历史追溯与个案分析均未改动。